

MEMPERJUANGKAN HAK ASASI MANUSIA

STRUGGLING TOWARDS HUMAN RIGHTS

# 为人权而奋斗



请联络我们：

## 吉隆坡总会

383, First Floor, Jalan 5/59,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7843525, 77820357  
Fax : 603-77843526  
Email: suaram@suaram.org

## 柔佛州分会

25 Jalan Pulai 13, Taman Pulai Utama,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Tel / Fax : 607-5211951  
Email: suaramjb@hotmail.com

## 檳城分会

85 Lorong Pekaka 5, Taman Desa Baru,  
11700 Gelugor, Penang, Malaysia.  
Tel / Fax : 604-6582285  
Email: suarampg@hotmail.com

大马人民之声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 五一劳动节庆祝会

##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问题交流会

资料册

2003年5月1日

## 柔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关于《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问题交流会》的说明

马来亚劳工党在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积极的参与了新马人民反帝反殖、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在宪制斗争的领域里，轰轰烈烈进行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然而，在 60 年代后半期，马来亚劳工党却因面对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与摧残，而在我国宪制斗争的舞台上消失了。

柔州的一些前劳工党人、社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前政治扣留者，从 70 年代以来，沉寂了几乎 30 年后，终于和一班有着冲天干劲、非常努力地在柔州各地推动争取民主人权工作的在籍或已毕业的大学生结合起来，在 2001 年 9 月 9 日组成了《人民之友工委会》进行工作，发挥了些微影响和作用。

为了唤起更多的曾经献身于我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左翼人士，特别是前劳工党人或其支持者，

希望他们能够总结经验、重新出发，也同时为了让年轻一代能够认识历史，吸取教训，更好地推动争取民主人权的工作，工委会曾在成立后不久，发出一份《关于马来亚劳工党斗争问题的 4 点讨论提纲》(请参考附件 1)，原想随即在人民之友的组织范围内展开研讨活动，之后发觉有些人不尽同意这样做，而把它暂时搁置起来。

“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作为一个人权组织成员，无论是年老一辈或年轻一代，不分先后继续为我国民主人权而奋斗，我们都希望可以从小来亚劳工党所走过的道路、他们所面对的困扰，以及从他们所领导的斗争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发展，我们队伍里外许多人开始对过去的历史和它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关注和进行反思。尤其是在《历史的另一面》编辑委员会，在今年初出版了《林清祥与他的年代》一书以后，一些年轻社会工作者才认

识到，在50至60年代，新马人民的反帝、反殖的宪制斗争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从而提问，这样庞大的队伍为何在70年代以后散涣了？30年的断层问题如何解决？今后斗争何去何从？

因为马来西亚劳工党是我国民族民主运动，在50至60年代宪制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组织，它有20年的斗争历史，有过较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在60年代后半期面对反动统治的残酷镇压与摧残，而在我国宪制斗争的舞台上消失了。它的历史使命有没有完成？它最后所走的道路，是对？是错？劳工党人在组织被摧毁以后的最后表现，是好？是坏？劳工党消失之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运动，是前进？还是后退？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研究。

马来西亚劳工党党史工作委员会在2000年出版的3部劳工党史册即《马来西亚劳工党斗争史》、《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与《马来西亚劳工党历史图片集》，以及柔佛州劳工党党史篇委会出版

的《走过的历史岁月画册》和劳工党槟州分部史料图片集工委所篇写的《历史的放歌 - 马来西亚劳工党槟州分部史料图片集》，是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对有关问题的思考研究，提供了最方便的条件。

在今年初，工委会决定，以研讨马来西亚劳工党斗争史问题，作为柔州人民之友庆祝今年国际劳动节活动的中心内容。为此，我们邀请了《马来西亚劳工党斗争史》执笔人朱齐英，特地为我们的这项活动，而写一篇《劳工党抵制大选及其历史使命》的工作论文；他也同时提供给我们，他的另一篇已交给《人文杂志》编辑部，题为《劳工党的民族民主斗争》的论文。同时我们也征求了《马来西亚劳工党文献汇编》编者陈剑虹同意，将他去年4月在檳城发表的一篇题为《乘风破浪：槟州劳工党激进化的过程（1963 - 1969）》（原文题为RIDING THE STORMS : RADICALISATION OF THE LABOUR PARTY OF MALAYA, PENANG DIVISION, 1963 - 1969）英文论文，由工委会找人

译为华文。我们将朱齐英和陈剑虹两人共三篇论文，合在一起，专印成册，分发出去，作为人民之友和有心人士研究和讨论有关问题的主要文件。

工委会决定，在即将来临的五一当天，在新山举办一项主题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 研讨马来亚劳工党的斗争史”交流会，广邀人民之友和有心人士集会讨论、抒发己见，作为我们今年庆祝国际劳动节的主要形式和内容。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人能够大胆的针对有关问题和工委会提出的4点讨论提纲，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更希望看到，会有许多人针对朱齐英或陈剑虹的有关见解，发表他们同意或者是不同意的看法和论点。我们这样做，为的是引起更广泛的讨论、更深入的思考、更精辟的见解，从而为我们今后争取民主人权的斗争找出正确的方向和路线。

工委会预先声明：这小册子里的论文，只是作者的个人言论。我们认为，不管是谁的意见，

只要言之有物，就是‘一家之言’，但是，我们不要只看‘一枝独秀’；我们必须鼓励‘百家争鸣’，我们更要看到‘百花齐放’。这是我们工委会处理上述以及其他工作或任何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柔佛州人民之友工委会**

**电话/传真：07 - 5211951**

**电邮地址：suaramjb@hotmail.com**

**2003年4月1日**

## 劳工党抵制大选及其历史使命

朱齐英

马来亚劳工党抵制 1969 年全国大选及 5.13 事件过后销声匿迹的过程，一直被后人疑为自动放弃议会斗争，准备走出宪制范畴，参加马共的武装革命队伍。

实际上，5.13 事件之后，劳工党的活动党员和干部在联盟政府最后一轮‘见到就捉’的不间断逮捕行动下，都纷纷各奔西东，不敢再回到党所去。各级组织全面瘫痪，联盟政府又不肯释放关在华都牙也和麻坡扣留营的中央和分部领导人，在外头的三几位高层领袖连重整工作都告有心无力，更加没有能力，也没有代表性去决定党何去何从。

1967 年 10 月在槟城新春满园酒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尽管大会主席演词充满革命豪情，被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宣言式提案却十分含蓄地提到

“必须在最大程度上把党革命化”，“建设成为一个有助于推动马来亚工人阶级完成历史使命的党，有能力参与推动马来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大会也没有趁热授权新中央修改党章，将劳工党从一个宪制政党改为革命党。

同年 11 月 19 日召开的新中央第一次会议，也没有修改党章的议程，反而是中央银行总裁在电台宣布马币贬值的消息成了会议的紧急议题。接着，1968 年 3 月 25 日的第二次会议，讨论焦点已集中在是否参加来届大选的课题上，直至 9 月的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抵制大选。正式的会议从未讨论修章事宜，不过，放弃议会斗争，甚至准备走出宪制斗争范围的议论，确曾在个别州分部的党讯、特刊，以及用‘中央秘书处’名义发表的文章中出现过。这种现象只宜解释为议而未决，不能说成劳工党的决策，因为，历史以完成的事实为准，未成为决策的议论不足以构成历史。

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简述如下，以便有心人对这一段史实作出较客观和正确的判断。

## 1. 抵制大选的事前讨论

1967年槟城大罢市之后，联盟政府塑造的白色恐怖已带有浓厚的血腥味道，马来亚劳工党首当其冲，新主席潜伏不露面，新中央则因三分之二的成员未能履任而无法正常工作，各州分部的命运也大致如此。

于是，吉打州分部秘书处于1968年1月16日，发表题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的指导性文章，分析大罢市及种族骚乱过后的国内局势，并提出党必须采取的应变策略。它指出，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敦拉萨主张封禁劳工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说不封党，于是，半封半不封是联盟政府当时的逻辑；而劳工党本身即没有非法斗争的物质基础，联盟政府又不允许该党通过合法斗争而生存发展，“合法不允许，非法又不可能，那

么，半合法半非法总可以了吧”。于是，“半合法半非法”遂成了劳工党最后的斗争新策略。

1967年10月的党大会已充满革命激情，1968年年头面对联盟政府的摧毁性大逮捕行动，尚且没有顺理成章地退出宪制斗争，反而根据联盟政府半封半不封的矛盾，采取相应的半合法半非法斗争策略。因此，同年9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不可能以抵制1969年大选作为退出议会斗争的前奏曲。

1968年3月25日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参加来届大选的问题交由基层讨论。各州分部的反应相当积极，吉打州分部率先于6月4日在第九期州党讯上发表“对1969年大选的意见”文章，明确强调“抵制选举，也是一种斗争形式”，“这次的抵制大选，并不等于以后长期下去永远采用抵制的办法”，甚至说明“以后如果参加选举对我们有利，我们仍然要参加”。其他各州，如：霹雳、雪州、柔佛、马六甲、森美兰等分部的讨

论也认定抵制大选有利于群众斗争的开展。槟州分部 3 月初的讨论主张参选，9 月第二次讨论，经检讨后，同意吉打州的想法。彭亨州分部则不同意抵制，惟有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基于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才接受会议的多数看法。

## 2. 抵制 1969 年大选的部署

中央扩大会议于 1968 年 9 月 28 日及 29 日在吉隆坡召开，鉴于白色恐怖依然笼罩，没有在巴都律党总部进行，必须由首都党员秘密安排外州代表到蕉赖路四哩半支部参加会议。当时，出席的中委会成员只有副主席苏锦祥、总财政崔耀才，中委潘志佳，其余皆为八州分部代表。这次会议一致议决抵制来年全国大选，以及训令党各级议员在大选前 3 个月总辞职。没有参加会议的副主席林建寿曾经公开表示异议，后来却遵循党的指示。

上述两项议决并没有放弃议会斗争的意图，而是将抵制来年大选当作一项“向敌人的假民主和野蛮政策表示严重的抗议，以打击和暴露敌人不民主的较高形式的斗争”。于是，劳工党中央便采取下列一连串造势步骤：其一，12 月 3 日，由崔耀才和柔州的黄展南召开记者会，代表中央号召党各级议员提前于 12 月 31 日总辞职；其二，同日，中央秘书处发表“致各民族同胞书”，并向联盟政府提出参选 11 项先决条件；其三，动员各地党员在党所张挂抵制大选布条，到处张贴标语，以及涂写斗争口号；其四，资深领袖如：林建寿、拉惹古玛医生、崔耀才以及甫从华都牙也扣留营无条件释放出来的陈秀英，在大选的 5 月份，相继召开记者会，或鼓励、或号召人民勇敢抵制大选、杯葛投票；其五，麻坡和华都牙也扣留营近 200 名政治扣留者自 5 月 4 日起，开展为期 7 天的绝食行动，以示支持劳工党抵制大选的斗争。

联盟政府虽有半封半不封的矛盾，但是，向劳工党封闭议会大门的决心却是相当一致。因此，11项先决条件无一受到重视与考虑；被封禁的劳工党支部无一解封；只放了一个陈秀英，其他众多中央领袖还关在扣留营里；最后更进一步搞垮劳工党主席许启针、副总秘书刘元华。在这种环境下，抵制大选的行动便没有转圜的余地。

1969年5月4日，甲洞支部党员林顺成因参与涂写斗争口号行动而遭警方开枪击毙，是无从预料的惨案。不过，他的出殡日期选在5月9日投票日前夕，却是甲洞支部领导层刻意安排，至于送殡人士多达3万之众，主持其事的人也始料不及。

### 3. 联盟下决心搅毁劳工党

劳工党的抵制行动并没有令各州投票率跌至50巴仙以下。不过，它的英勇斗争却给予联盟，特别是马华最沉重的打击，致使它们丧失吉兰丹

和槟城州政权，雪州与反对党平分秋色，无法组成政府，同时第一次在西马失去国会三份之二优势，而马华的席位减到13席，多名部长齐齐落选。

随后发生5.13种族屠杀，联盟政府乘机对劳工党展开摧毁性的大逮捕行动，不仅又一次封禁17个支部，而且也将劳工党活跃党员的照片，在戏院放映，实行英殖民政府对付马共党员“见到就捉”策略。1972年6月，社团注册官在宣布撤销劳工党注册时说明：该党支部由5.13之前的244个减到只剩24个，内政部查禁其中161个，包括槟城、霹雳、马六甲和柔佛州4个分部；38个支部注册被吊销，换句话说，联盟政府封掉了至少三分之二支部。可见，劳工党在1969年所遭到摧残何其惨重，就算残存的24个支部，也是另一番景象。

1969年10月18日，劳工党最后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在吉隆坡总部召开，出席者有：副主席林



建寿、总财政崔耀才、中委陈秀英以及 14 位州代表。会议成立 5 人工作小组，即：林建寿、崔耀才、陈秀英、拉惹古玛医生和霹雳州主席莫哈末阿里，负责整顿党各级组织。他们很快发觉到活动党员不知何处去，仅存的一些党所，如芙蓉和居銮支部早已被各类地下组织成员鹊巢鸠占。找不到熟悉的党员干部，5 人小组自是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劳工党在之前的 10 年里头，可谓经得起风风雨雨，内安法令一次又一次地逮捕各级领袖，非但没有削弱它的力量以及阻碍它的发展，反而令它不断壮大，以至于有能力掀起如槟城大罢市、抵制 1969 年大选那样规模宏大的斗争。但是，再坚强的生命力也经受不了连根拔起的摧残手法。从社团注册官所公布的数据，也证明联盟政府不只是向劳工党封闭议会大门，连宪制大门也关上了，而劳工党本身确已无力以行动来回应对方的扼杀行动。

劳工党最后一届中委会成员之中，只有一位中委参加马共的武装斗争，绝大多数都在内安法令下被囚禁。这个现象也可以说明，劳工党中央在决定抵制大选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联盟政府毁党的决心，因此也未曾具体讨论到党何去何从的议题。至于吉打、槟城和霹雳州分部多位领导干部上山打游击，也可以反证个别州分部早已自寻退路而非党中央。

#### 4. 历史使命只完成一半

劳工党的历史使命，一向只见于党章的 8 项宗旨，1966 年在新山召开的特大，才定调为民族民主革命。1967 年全代会所提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所下的判断，套在劳工党身上显然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中国只经过极短期的半殖民地状态，而我国却曾经是具有近 200 年历史的殖民地，同样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确认国情，实况却有天渊之别，所以，不提劳工党的历史使命则已，要提仍需符合党章精神，

以及 54 年以还的斗争实践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准。

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以及援越反美运动，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我国摆脱英国的新殖民统治走上真正独立自主与不结盟的道路。这项使命，在劳党存在期间，并没有实现。不过，它所创造的严峻形势，却逼得敦拉萨领导的国阵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中立立场，既与中国建交，又一度与苏联过往甚密。

不论民主革命，或是新民主革命也好，劳工党这一半历史使命确实未曾完成。自敦拉萨到拿督斯里马哈迪，国阵政府始终没有将我国民主，甚至于议会民主恢复到独立初期的水平。1960 年实施的内安法令以及随后修订的警察法令，至今还在跟宪法精神相违背；地方及市、乡议会选举一去不复返；我国人民对于外国的百万人大集会以及示威游行，只能望梅止渴，羡慕不已。

尽管不是本身通过有效的斗争手段完成，劳工党的历史使命事实上已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应由谁来完成，可真的值得商榷和争论。大部分前劳工党人都认为党早已不复存在，历史使命就算未完成，也无能为力，谁愿意来完成则无任欢迎。另一小部分却坚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尚需努力”，于是，有者参加马来西亚人民党，有者参加公正党，重回阔别的政坛。无论那一种行动，谁都未曾对劳工党 21 年的斗争，进行过认真和具体的检讨。可悲的是，《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出版了两年有多，看过一遍的前劳工党人竟是少之又少。

没有看过《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的人讨论劳工党是否完成历史使命，难免失之历史事实；未曾依据《斗争史》的史实认真检讨劳工党的经验教训，就算重新从政，也会感到一片茫茫，不知从何下手。

# 劳工党的民族民主斗争

朱齐英

## 一. 泛马劳工党 ( 1952 - 1953 )

英殖民政府于 1948 年查封绝大部分政党、职工会及各业团体之后，便通过种植工友联合会、职总以及公务员职工会等，刻意培养性命是从的所谓“自由职工运动”领袖。1951 年，为推行殖民地议会民主，以削弱马共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英武装斗争，它又积极鼓励这一类职工领袖着手组织政党并参加即将举行的地方性议会选举。泛马劳工党便是英殖民政府所扶植的其中一个全国性政党，当时的势力还伸展到新加坡海峡殖民地，仅次于巫统和马华。

泛马劳工党于 1952 年 6 月 26 日成立大会上所通过的 7 项决议和 8 点国家纲领，即使从现在的环境回顾，也没有什么值得非议。例如，7 项决议中的“支持以出生地原则赋给人民公民权”、“希望生于斯的所有人

士以及那些住上 10 年而又愿意把这个国家当成永久家乡的人，都能获得马来亚公民地位”、“泛马劳工党不是为马来亚政治和经济独立而斗争的唯一政党，而是我国独立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日薪制度已越来越不受欢迎，必须加以废除”。应该略加解释的是，上述“我国独立运动”的目标相当明确的包括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在内。同时，大会也决心申请成为以英国工党（当时是执政党）为首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一名观察员。

只不过，它其实是各州甚至於各地方性劳工党的联合体，组织十分散涣。不到一年，以佐哈里和西努为首的吉打州 SABERKAS 便转投巫统，第二年，新加坡劳工党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层，而一个大山脚山城，居然出现威省劳工党和大山脚劳工党两个组织。加上党主席苏比的投机性格，又将泛马劳工党导向一条反共不反殖的道路，致使成立大会的 7 项决议和 8 点纲领沦为美丽的谎言。

## 二. 走上反殖不反共的民族主义道路

1954年6月泛马劳工党在檳城召开代表大会，议决更换党名为“马来亚劳工党”。在此之前，该党已在逐步纠正党高层和党主席苏比的一些严重错误，如：修改党章，改为中央集权制；不参加巫统和马华的联盟；下令两名官委立法议员在立法议会反对“联邦协定修正案”等。

上述大会另有两大成果，一是更换了领导人，雪州的李木生和檳州的陈朴根分别当选主席和总秘书，二是在新党章内立下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8大宗旨。从此，马来亚劳工党便步上“为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自主及民主的马来亚国”的民族主义道路。此时虽只有檳城、霹靂以及雪兰莪三个州分部，新中央领导层的新作风，却令到该党面目为之一新。例如，当年9月，英国在野工党7人访问团抵达新加坡，总秘书陈朴根专程前往向他们提呈备忘录。备忘录谴责钦差大臣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力太大，妨碍马来亚的独立和民主发展；要求英政府结束紧急状态；取消9州的州籍民制度，以加速马来亚成为单一的国家。

中间虽然经过8年的社阵阶段，马来亚劳工党非但没有乖离既定的道路，反而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把民族民主这两项历史任务发挥得淋漓尽致，同时呈现了一个个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动人事迹。

### 三、继承传统民族主义运动

如果说拉玛纳旦和陈朴根当权时期的马来亚劳工党，还带有一些西方色彩以及投机主义倾向，那么，1957年社阵成立以及在1959年，40年代著名马来民族主义领袖布斯达曼和依萨莫哈末分别当选为社阵主席和劳工党主席之后，马来亚劳工党的民族主义运动才算真正接上了传统的轨道。

就如早期的马来民族主义运动与印尼的独立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样，社阵人、劳两党的马来领袖，甚至党员，都与印尼各政党，特别是苏卡诺总统的人民党和印尼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由於1948年有相当部分马来民族主义领袖和干部都参加了马共领导的抗英武装斗争，他们与人、劳两党

内的旧同志继续保持秘密联系，都在所难免。上述两种国内外的联系，其实也存在於巫统和泛回内部。

马共於上世纪 50 年代完成北撤后，一度与半岛的地下组织失去正常联系，致使地下活动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尽管如此，个别地下组织依然有能力对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特别是人、劳两党的华校源流党员发挥一定的影响力。源自工运和学运的干部党员全面加入之后，很快就控制了人、劳两党的基层，甚至於各州分部。

以上的事实，导致劳工党内的部分中央领袖，如：拉玛纳且、陈朴根等人受到孤立以至於淡出政坛，只有林建寿、巴古南、崔耀才、陈志勤、V.大卫等人还能与基层合作一个相当长的日子。其后，活跃於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初期的魏利煌医生和拉惹古玛医生先后加入劳工党中央，也有助於促使该党上下一致纳入传统民族主义运动中。这种和谐情况，在陈凯希以副总秘书身份长驻中央秘书处的期间，曾达至最

高峰，不仅劳工党内部团结一致，社阵人、劳两党的关系也获得充分的协调和加强。

#### 四．民族民主运动的具体斗争

马来亚劳工党在我国民族民主运动中所进行的其中一项具体斗争，是长达 4 年的反“马来西亚计划”运动，那也是在社阵时期完成的一场最具有民族主义特色的斗争。

英国人通过东姑阿都拉曼泡制一个包括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砂劳越、沙巴和汶莱在内的五邦马来西亚计划，以便延续对五邦的新殖民统治，以及镇压和消灭汶莱、砂、沙三地人民的独立斗争。

社阵在布斯达曼的领导下，於 1962 年 1 月 26 日在吉隆坡精武体育馆，召开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除沙巴外，其余四邦左翼政党尽皆派出党内精英代表出席，著名的领袖有：马来亚劳工党的依萨莫哈末、陈志勤、林建寿、陈朴根、威拉班；马来亚人民党的

布斯达曼、那沙隆、达裕汀卡哈、加南星、祝俊雄；新加坡社阵的李绍祖、兀哈尔、林清祥、傅树楷、多明尼布都查里；汶莱人民党的阿凡提、奥玛达敏；新加坡工人党的马绍尔、岑忠民；新加坡人民党的华哈沙、耶也、汤永钊；砂劳越人民联合党的杨国斯、田绍熙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原是主催团体，可是，其代表团却於会议途中全体退出。当时的列席团体还有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南洋大学政治学会及新加坡工艺学院政治学会。

大会最后通过 13 项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以及坚决反对新殖民统治的提案。现举其中三项，以方便区别当时盛行於我国政坛的种族政治与种族主义：—

1. 严厉谴责联盟政府和英国政府提出的马来西亚计划，它违背传统马来西亚概念的原意并将导致针对这个区域的进步力量和印尼共和国的军事威胁；

2. 要求英国立即给予北婆三邦人民民主的大选，如果三邦人民通过大选，表达要组织“北加里曼丹联邦”的愿望，英政府应准许其实现；

3. 支持亚非会议的原则，特别是有关铲除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以及裁军方面的原则。

自此以后，反马来西亚的斗争风起云涌。1962 年 12 月，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全胜的汶莱人民党，发动武装起义，3 天内遭英军救平，随后成立国民军，继续武装斗争。翌年，砂劳越共产党发动武装革命，与汶莱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互为呼应。这期间，印尼和菲律宾两国政府同时以不同理由，公开反对马来西亚，前者甚至与英军屡屡发生边境冲突。尽管如此，马来西亚终于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宣告成立。第二天，东姑阿都拉曼就宣布国家进入备战状态，由此引发 3 年风风雨雨的马、印对抗。

在非战区的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左翼及职工运动遭到开国以来的最大镇压，新加坡社阵中央委员会在 2.2 大逮捕行动中，失去了副主席兀哈尔、秘书长林清祥、副秘书长傅树楷以及 7 名中委，一时陷入半真空状态。马来亚社阵主席布斯达曼也於 2 月 13 日被捕，由他和傅树楷维持的五邦社会主义政党大会联络秘书处因而名存实亡。

马来亚社阵於同年 4 月与 6 个反对党组成反对党联合集团，并派出以前农业部长阿都亚兹为首的代表团晋谒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纳拉辛汉，向他提呈反对大马计划备忘录。这 7 个反对党为：马来亚人民党、马来亚劳工党、泛马回教党、林苍佑成立的民主联合党、阿都亚兹成立的国民议会党、拿督翁成立的国家党，以及人民进步党。

1964 年 4 月全国大选，社阵（国民议会党此时已加入）的竞选主题是反对马来西亚，而联盟则以反对印尼扩张主义为宣传重点。尽管社阵代总秘书魏利煌医生不断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和平解决大马危机”5 项

主张，而副总秘书陈凯希也在电台进行竞选广播中，力驳联盟特别是马青对社阵与印尼勾结的指责，始终挡不住对方掀起“反印尼，保卫马来西亚”的逆流。加上 7 个反对党终于在反对马来西亚课题上发生了分歧，致使联盟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由三党组成的社阵只赢得国会 2 席和 8 个州议席，与 1959 年大选成绩比较，显然逊色得多。

此时，社阵的反大马运动已具有下列内容：—

1. 和平解决大马引发的危机。
2. 反对征兵。
3. 反对派兵到婆罗洲参加无意义的战争。
4. 要求释放数百名未经审讯，并受到不良对待的政治扣留者。
5. 要求废除内安法令。
6. 呼吁人民维持工人和农民的合作，反抗帝国主义以及保卫我国主权。

## 五. 援越反美运动

1963、64 以至 65 年，社阵人、劳两党的高层马来领袖先后成为内安法令的牺牲品之后，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由此淡化，代之而起的是毛泽东思想。两党分别的变化是：人民党中央由种族主义倾向的领袖所掌控，进而退出社阵；劳工党中央自陈凯希和拉惹古玛医生被捕后，高层领袖与基层的矛盾立即呈现尖锐化，最后於 1966 年 9 月的特大上，5 巨头总辞职被接纳，领导权遂全面落入新一代领袖手中。

1966 年，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爆发了如火如荼的援越抗美游行大示威。在“马来亚人民亚非团结委员会”的号召下，马来亚劳工党也差不多同时发动了全国性的援越反美运动；运动的项目除了在各州分部和支部举办越战图片展之外，也在各地举行一连串反美游行示威，内容包括反对美军来我国渡假，反对美国正、副总统约翰逊和韩富礼先后来访。各地的反美示威以檳城、吉隆坡以及柔佛为最烈，尽管声势不如 1965 年的“2.13”争取人权大游行，不过，各地此起彼

伏，花样百出，而且也出现火炬游行，都足以汇成一片反美浪潮。

在援越反美运动中，由於与联盟政府的亲美政策背道而驰，马来亚劳工党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除了数百名参加示威的党员被控上各地法庭，以及百多名干部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之外，也付出了一名年轻党员的生命。他就是於 1966 年 10 月 30 日在吉隆坡参加反对约翰逊总统来访示威游行时，被美国新闻处守卫开枪射击，死於路堤的安邦支部党员王忠。他也是劳工党宪制斗争中被杀害的第二位烈士，第一位是争取集会自由，死於镇暴队员乱棍之下的霹靂州分部委员唐保光烈士。

## 六．反对联盟政府收缩议会民主

联盟政府从英国人手中接过来的议会民主，原本就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西方民主制度，司法即不独立，选举委员会也没有独立行事的权力，一切应该独立的机构都听命於执政党。独立后，联盟政府又先后取消



地方议会和市、乡议会选举，只保留 5 年一次的州议会和国会选举。独立初期，各政党举办群众大会、大集会、露天文娱晚会以及大辩论等，都易过借火，马印对抗期，联盟政府以紧急状态为由，全部申请予以冻结，过后便不再恢复。

1948 年颁布的紧急状态以及紧急法令的实施，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无限伤害和压迫，独立后，联盟政府只实现撤除紧急状态的大选承诺，紧急法令则代之以 1960 年内部安全法令，内政部长和警方依然拥有不受法律挑战的绝对权力，可以不经审讯而长期监禁任何人。相当讽刺的是，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逮捕的第一人，并非预定的马共份子，竟是马来西亚劳工党柔佛州东甲支部秘书吴恩，而且还是在内安法令生效日（8 月 1 日）这一天。

联盟政府的上述行为受到社阵人、劳两党最强烈、最坚韧的反对。特别是一开头就对付社阵人、劳两党领袖和干部的内安法令。其中一次最具影响力的行动，便是 1965 年的“2.13”争取人权游行示威。

这次行动原本号召全国各地数万名党员齐集首都，先在精武体育馆举行大集会，接着下山游行，直到巴都律的党总部。可是，警方禁止这次和平游行，不但照会精武体育馆退回租金，还在精武山下围上铁刺网，不准任何人上下。除此之外，各州警方更在“2.13”前夕，对火车、公共汽车和德士，进行严格检查，凡是可疑人物都不得续程前往吉隆坡。当然，首都警方更是风声鹤唳，到处搜捕外来的左翼份子，以期瓦解大游行计划。

2 月 13 日凌晨一时，游行总策划陈凯希、社阵总秘书达裕丁·卡哈同时被警方逮捕。可是，数千名人、劳两党党员仍然按照临时更改的计划，齐集党总部，按时出发，勇敢而灵活的突破镇暴队的重重围堵，从巴都律游行到市中心，又从市中心回到党总部，最后在如雨般的催泪弹攻击下，宣告解散。

这次大游行的规模虽然远逊於 1969 年的林顺成出殡游行，但是，它却直接促成马来亚劳工党的量变，使它的斗争策略由纯议会斗争转为群众斗争为主、议

会斗争为辅；全党摆脱合法主义思想的枷锁，大胆地走上街头；党内的理论也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党员的学习对象是中国的革命烈士和越南的战斗英雄，只差没有走出宪制斗争范畴而成为正式的革命党。

## 七．槟城大罢市

1967年11月24日，槟城大罢市的头一天，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还习惯性地归咎於马共幕后指挥。第二天，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敦拉萨收到准确的情报后，便直接指责劳工党槟州分部领导这场运动。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劳工党槟州分部在州主席林建寿的指挥下，成立一个以分部副主席许平城为首的9人行动委员会，负责策划和开展大罢市斗争。由於州分部尚未受到严重的摧残，在布置人手和动员群众方面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困难，加上林建寿以国会议员身份公开指责货币贬值措施，并发表人民有权以各种和平方式表达不满情绪的言论，24日当天，全槟城，包括威省变成死市。第二天，种族主义者发动攻

势，大罢市运动即时质变为种族骚乱，北马一带被列为戒严区。

自此一役，联盟政府便决心摧毁劳工党各级组织。在波浪式的大逮捕行动下，新中央委员会三份之二成员未能履任；槟州分部只剩下前乔治市市长崔耀才在支撑场面；霹靂州分部早在1965年便以地下领导的方式在操作；雪州分部大摆“空城计”；柔州分部改由8个行政区自行活动，其余分部皆无法顶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先后陷入瘫痪状态。

## 八．抵制大选与林顺成出殡

尽管劳工党各级组织遭到无情摧残，但是，各州组织还是有能力派出代表参加1968年9月28日及29日在吉隆坡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一致决定抵制1969年全国大选以及训令全国各级议员於大选前3个月总辞职。

12月3日，全国财政崔耀才代表中央召开记者会，号召党各级议员於12月31日之前总辞职。结果，除了居銮4名市议员拒绝辞职而被开除党籍之外，其余百多名各级议员，包括国会议员林建寿和扣留营的州议员及市议员，尽皆如期向当局呈上辞函。

1969年全国大选订在5月10日。4月1日，劳党还能出面的知名领袖，如林建寿、崔耀才、陈秀英、拉惹古玛医生等人，纷纷公开号召人民杯葛投票。劳党中央秘书处也动员全国党员展开各式各样的抵制行动，如：在党所张贴布条、沿户分发宣传品、到处张贴标语、涂写口号等等。5月4日凌晨，甲洞支部党员林顺成响应党的号召，与几位同志在甲洞大街涂写抵制大选的口号，不幸遭到闻风而来的武装警员从后面开枪击毙。这宗惨案立即引起全吉隆坡人民的公愤。

5月9日，林顺成出殡，3万多人参加了送殡行列。队伍从积善堂出发，经过市中心，在巴都律劳工党总部稍停，沿途受到市民们驻足聚观。之后经怡保路直赴甲洞华人义山，全程竟无一人离队。值得一提

的是，全场游行计划皆由甲洞支部治丧委员会统筹统办，独立指挥。向警方申请出殡准证是由劳工党中委陈秀英和马大学生会主席赛哈密代办。

客观地说，劳工党的抵制大选行动，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各州投票率最低者仍有50多巴仙。不过，在打击联盟特别是马华方面，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使它失去两个州政权，雪州组不成政府，同时也丧失国会三份之二议席优势。

其后发生“5.13”种族暴乱，联盟政府乘机再向劳工党人进行不间断的逮捕行动，终于导致劳工党全面瘫痪。1969年10月18日，劳工党最后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在党总部召开，会议成立5人小组，负责重整各级党组织，可是，小组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挽狂澜於既倒，马来亚劳工党于是回天乏术。

编者按语：

作者已将此文交给《人文杂志》发表。

作者应邀特地为本工委会庆祝今年国际劳动节举办“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问题研讨会”，而写的《劳工党抵制大选及其历史使命》工作论文，是跟此文互相联系、前后呼应的。

作者在《劳工党抵制大选及其历史使命》中作出“历史使命只完成一半”的论断，读者大略可以从此文中看到他的根据与说明。

# 乘风破浪

[檳州劳工党激进化过程]  
[1963-1969]

陈剑虹 著  
[檳城英迪国际学院商学院讲师]

北方 意译

## 文章内容摘要

这篇文章首先追溯马来亚劳工党槟城分部在 1960 年代早期的成长。文章也指出，到了 60 年代末，它是在怎么样的背景下，从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极左的政治运动。

文章也分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下，党如何深化它的激进化过程。

文章最后提出初步看法说明，在 1970 年代，思想意识的转化过程，如何影响党和槟城的竞选政治。

## 绪言

马来亚劳工党槟州分部原本是一个地区性的政党。自从 1951 年成立后，就一直根随着英国工党社会主义的政策。

1959 年，党修改党章，公开阐明其政治目标，那就是：“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马来亚而奋斗”。

## 党的经济目标

“为劳心或劳力者争取他们的十足成果，而根据生产方式共同拥有分配及交换的制度，在可能范围内争取他们的劳动成果的最公平分配，并争取每种工业或服务业管理与统制的最佳制度。” (Tan 2000: 19)。<sup>1</sup>

在 50 年代，本着民粹主义的理想和辛勤耕耘，党成功地走过了一条崎岖的道路。在 1961 年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它的政治命运后来被扭曲。这是因为在大马成立过程的一系列事件中，它迫不得已进行某些宣传工作，并做了它原本不想做的事。在快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它身不由己地走上了激进化的道路。

这篇文章打算追溯槟州劳工党的思想意识的转化，分析它采取“群众斗争”强硬路线策略的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表现。

作为结束语，文章将简要地叙述槟州政党政治走上冒险主义的结果。

---

<sup>1</sup>1954 年马来亚劳工党章程。

## 1960 年代初的檳州勞工黨

1957 年 12 月，檳州勞工黨在市議會選舉中戰績輝煌，獲得了 8 個多數議席。<sup>2</sup> 1958 年，就一躍成為喬治市執政黨。

這是因為它擁有一批信譽卓越的专业人士和職工領袖，所以得到市民廣泛支持，尤其是長期被聯盟忽略的下層人民的支持<sup>3</sup>。

接着，在 1959 年國州議會選舉中，黨誓言，“要通過和平，非暴力，民主和憲制手段，取得民主國家的政權”。他們輕而易舉地在檳州贏得 5 個州議席 3 個國會議席。他們以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

[“社陣”] 的政策綱領取勝。社陣是由馬來亞勞工黨和人民黨所組成的<sup>4</sup>。

1961 年，檳城市議會進行選舉，奉行多元民族政策的社陣，春風掃落葉般奪取了 15 席中的 14 席，取得輝煌成果。

黨的 4 個候選人，市長黃添壽、副市長巴古南、拉馬那旦和林建壽，在非純粹印度人或華人選區贏得了絕大多數票。巴古南在一個純粹華人選區同馬華候選人對壘；而黃添壽和林建壽則在馬來選民人數不少的選區中選<sup>5</sup>。

<sup>2</sup> 原本中選的 5 名市議員是：拉曼那旦，陳樸根，崔耀才，沙峇巴迪，和大衛。拉馬那旦的任期只有一年。不過，跟另三名新市議員，即林建壽，黃添壽和李國良，他再次中選為市議員。

<sup>3</sup> 這點，可以從下面一個事實得以證明：1958 年 1 月 5 日，檳威普通工聯和另 8 個檳州重要工會，舉行聯歡會，一同慶祝檳勞黨競選勝利。他們的代表在集會上發表激昂演詞[6. 1. 1958 光華日報]。競選前，勞工黨曾在几宗事件中替有關人士打抱不平：1956 年 11 月 23 日事件發生過後，58 名中靈中學學生被開除；1957 年 11 月 14 日華校生抗議罷課；1957 年下半年的 Eastern Smelting Co. 和 Straits 把 Trading Co. 罷工事件。這三個課題，加上黨在學校和立法議會的多元語文政策，以及建議通過與馬共和談結束緊急狀態的建議，比聯盟勝了一籌，因而在競選中旗開得勝[2. 2. 1957；8. 5. 1957；9. 6. 1957；9. 8. 1957 光華日報]。

<sup>4</sup> 雖然社陣在獨立日成立，其實，它在 1958 年 8 月 26 日才正式註冊。以〈走向一個新的馬來亞〉為題的政策聲明，主要是黨總秘書林建壽不懈努力的結果。他也特地為檳城選民起草了題為〈走向自由和重新建設〉。他是牛津大學出身的律師，在黃添壽的邀請下，於 1955 年大選期間加入勞工黨。起初，於 1956 年 5 月，他是丹絨西支部主席。同年 6 月，他入選為檳州分部執委。當他中選為市議員後，就當上檳州分部主席。由於他領導有方，理論水平高，於 1958 年 6 月，被選為檳州主席。1959 年，在 Dato Kramat 選區勝出，當上國會議員[1. 5. 2000 專訪林建壽；31. 5. 1956；4. 6. 1956；9. 6. 1957；16. 6. 1958；1. 5. 1959 光華日報]。

<sup>5</sup> 馬華會長謝敦祿醫生指責社陣是用似是而非的論調，和挑起種族情緒的政治口號獲勝。林建壽提出這几点反駁他。[看社陣總秘書林建壽 30. 5. 1961 聲明]

## 檳市議會如何操作

正确的策略和远大的计划，是檳州劳党在竞选中连年告捷的原因之一。党在组织上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党工作人员和干部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这些党工作人员就是 1958 年过后加入党的檳威普通工联和马来亚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领袖和成员<sup>6</sup>。

许多受马共影响的地下分子这个时候也接到秘密指示，要他们加入檳州劳工党，以便等待时机，打跨联盟<sup>7</sup>（见 Vasil 1971: 125）。

另一批则是华校毕业的左派青年。他们或多或少都曾涉及学生运动。他们参加劳工党，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和解放全人类”。他们在扩大劳工党的影响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

<sup>6</sup>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林景新。他是普通工联的主席，后来成了檳州劳工党双溪檳榔支部主席。

<sup>7</sup> 马共撤退到馬泰邊境后，其外圍組織如：中北馬的“愛國民主同盟”和南馬的“民族解放同盟”都停止活動。他們的成員被指示，完全退出組織或參加勞工黨或人民黨[11.7.2001 專訪 1959-1967 年受馬共影響的最重要檳州勞黨幹部 SZS]。

当时，有一个“会议前小组”，其目的是把党负责人和市议员拉在一起集体工作。这小组的成员包括檳城市内所有支部的代表和所有的市议员。

在这些非正式会议上，党负责人和干部把影响带到市议会去，在市议员中贯彻党的思想。同时，让市议员了解群众的感受。<sup>8</sup>

檳州劳工党从 1959 年的区区 18 个支部，到了 1963 年，增加到 38 个支部。这些支部属于檳州分部，注册地址是 274, Macalister Road, Penang。

乔治市内有 6 个支部，市区外共有 17 个支部。威省则分为三区：北海北区 7 个支部，北海中区 4 个支部和北海南区有 4 个支部。<sup>9</sup>

分部 14 名执委中，有 2 名是留学海外归来的专业人士、一名教师、一名职工领袖、一名高级技术管理员。

---

<sup>8</sup> 林建壽：[〈對下屆州選舉的展望紀要，1964〉]。  
<sup>9</sup> 勞工黨檳州分部〈1963 年常年報告〉。

在党组织内，他们担任重要职位，如：主席、副主席、义务秘书、副义务秘书。其他 10 名是书记和工人。这些都是运动中冒出来的青年领袖，其中 4 名还是社阵中具有影响力的“十大金刚”。<sup>10</sup>

## 1962 年准备夺取槟州政权

当时，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早在 1962 年初，党就开动竞选机器；准备夺取槟州政权。在“巩固城市胜利，发展乡村地区”的口号下，他们制定了三个重要策略：（一）巩固已取得的 14 个城市选区；（二）夺取槟岛地方议会政权；（三）成为威省三个地方议会的强大反对党。

为了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政权”<sup>11</sup>的伟大宏图，槟州劳工党的三个重要小组开始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政治小组紧密联络组织小组和宣传小组，通过

举办工作营和讲座，培养和训练党干部。同时，他们也制定小组政策，并领导贯彻这些政策。

组织小组把各地群众组织起来，成立支部，通过福利工作来扩大党的影响。为了解决内部矛盾，组织小组也负起任务，铲除宗派主义和颠覆活动。

宣传小组的任务是，策划群众大会，收集宣传资料和训练一批新的宣传工作人员。<sup>12</sup>

为了动员所有资源，加强活动，槟州劳工党秘书黄添寿在报章上，宣布党准备夺取槟州政权的决定。

<sup>13</sup>

为此，林建寿呼吁劳工党第 10 次全国党代表常年大会给予全力支持，并且，要求加强社阵的党纪律，包括全面发展宣传工作，并加强党领袖的政治教育工作。<sup>14</sup>

---

<sup>10</sup> 這些都是 20 來歲的黨工作人員。他們擅長於組織與宣傳工作。他們是：陳忠武，陳福興，鍾成利，陳潘欽，施忠生，甘幼華，許平城，謝思亮，陳立志，陳福麟。其中兩人後來成為州議員，另一人當了副市長，還有一人成了市議員兼副總秘書，後兩人被選為勞工黨中委。

<sup>11</sup> 在分部主席眼中，‘權力就是權威’。正確使用權力就是正確使用權威。社會主義權力就是根據人民的願望正確行使權威。[看林建壽：〈對下屆州選舉的展望紀要，1964〉。

---

<sup>12</sup> 政治小組 29. 7. 1962 內部傳閱的決議。

<sup>13</sup> 27. 10. 1962〈光華日報〉。

<sup>14</sup> 檳城分部在勞工黨第 10 屆常年大會上的演詞。會議在吉隆坡舉行。



## 采取实用主义与温和路线

在创党人和一批年青有为的积极分子集体领导下，檳州劳党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实用主义和温和路线的立场。

在 1960 年的常年大会诸多决议中，其中有 17 条，涉及国内的课题，如：修改宪法、外资、土地改革、乡村发展、失业问题、橡胶园地分划、外交事务、外国驻军、政治拘留、免费小学教育、民事和教育服务、庆祝五一劳动节、承认南洋大学文凭、国语班和黄色文化等。

本着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大会通过了两个决议：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和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sup>15</sup>

同年，新山举行劳工党第 8 次全国常年大会。大会上，也几乎完全接纳了这些决议。当时，大会由党主席依沙哈主持。<sup>16</sup>

---

<sup>15</sup> 23. 5. 1960<光華日報>

<sup>16</sup> 在這大會上，通過了兩項關於中國的重要決議，表明黨的立場第一。一項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個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 22. 8. 1960<光華日報>；[勞工黨第 8 屆常年大會會議記錄，20-21/8/1960，附錄 5.]。

不过，由于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于 1961 年 5 月宣布成立大马的建议，所以劳工党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国际事务方面去了。

同年 8 月，林建寿在第 9 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一项原则上接受大马的决议。并且，提醒本区域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为和平与中立而作出努力。同时，要维持和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

他也重申，劳工党支持社阵召开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大会的决定，以便探讨大家合作的详情<sup>17</sup>。

9 月，林建寿以刚上任的党秘书长身份，强调：新马合并，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新马合并必须建立在反殖民主义和争取自由的基础上 (Tan 2000: 359)。

完全出于殖民主义者的利益和地理位置的需要，经过长期策划和活动，马来西亚联邦终于在 1963 年成立了。不过，它是遭到国内人民抗议，以及在印尼对抗的情况下成立的 (Poulgrain, 1998)。

---

<sup>17</sup> 1961 年勞工黨第 9 屆常年大會紀念特刊。

社阵执政下的檳城市议会，拒绝参与大马成立日的庆典。市议会蓄意不服从联盟州政府的命令，不张灯结綵，不挂旗，不建排楼等。后来，州秘书接管市议会内的工作，快马加鞭地办理庆典事宜，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 “冷藏行动”和大马成立

林建寿呼吁所有的社会主义势力，团结一致，“反对反动派和新殖民主义势力，以及那些为他们服务，企图破坏我们团结的伪装社会主义者”。

他严厉批评那些以和平与安全为借口而支持大马的人，是在演戏。

他似有预感地警告说，“除非我们完全改变我们的想法，和除去大马概念中自相矛盾的看法，大马最终发生冲突和瓦解，那是不可避免的。”<sup>18</sup>

---

<sup>18</sup> 劳工党第 10 届常年大会谴责马来亚政府，在一年前同英政府勾结‘不顾人民的愿望，企图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在这区域实行新殖民主义。’[详情请看劳工党<1962/1963 年常年报告及有关文件>]。这份文件是在 1963 年 10 月 5-6 日假吉隆坡精武体育馆举行的劳工党第 11 届全国常年大会提早的。

普通党员对大马的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二月初发生的“冷藏行动”所致。新加坡林清祥和所有的社阵领袖以及 SATU 工团领袖被逮捕，对此，他们表示愤慨。

对他们来说，这个大逮捕行动，加上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 11 天后也被逮捕，这纯粹是为了瘫痪星马两地的左派势力。这个大逮捕行动确实严重恶化了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sup>19</sup> 从此，就撒下了政治疏离感的种子。

### 1964 年竞选失败 劳工党受严重打击

随着市议会于 1963 年 6 月，指控市长拉马那旦贪污舞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sup>20</sup> 联盟乘机在 1964 年大选活动中，猛烈抨击社阵。

---

<sup>19</sup> 第一次对社阵进行大镇压，发生在 1960 年 11 月。霹靂和雪蘭莪州有 20 名领袖被捕，包括副總秘書許博義[6. 11. 1960 星洲日報]。布斯達曼被捕后所产生的影响深远。SZS 在 11. 7. 2001 專訪中，証實了這一點。

<sup>20</sup> 拉马那旦已辭職，他在 1963 年 6 月 11 日的市議會會議中，与劳工党分道揚標。他指責市議會處事有不正常的地方。他特別提到，重修 Chowrasta 菜市场時有詐欺的現象；城市策划与建築小組，与交通小組有舞弊行為。他也質疑林建壽律師樓是否适合代表客戶，向市議會的部門進行交涉。結果，三名市議員退黨，另一名退出人民黨。在喬治市的一批支持者也尾隨他們而去。3 年后成立的調查委員會，查明這些指責不實，並沒有可信的証据供查核。‘貪污案不能成立，因而不能提控。’但是，這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黨的聲譽，導致

由于社阵反大马和支持北婆罗州的起义，社阵经常被指责为印尼的第五纵队。在一些城市选区，社阵党的牛头标志，甚至被利用来当作社阵叛国的象征，从而吓走选民。

社阵和劳工党在全国发表了竞选宣言，希望在国会和州议会获取更多的席位。宣言概要地阐明了党对大马，国家主权和国防，宪制改革，社会经济等课题和问题的立场和政策 (Tan 2000: 218-225)。

除了重申他们承认大马是个既成事实以外，他们誓言，坚持给予婆罗州人民自决的权利。为了和平解决大马课题，社阵提出了五点和平计划。<sup>21</sup>

在檳城，劳工党草拟了另外一篇宣言，说明他们要组织下一届州政府的最终目标。他们把恢复檳城自

---

党在 1963 年市議會選舉中，失去 5 個議席。因票數微差而敗給林蒼佑所領導的民主聯合黨 [5. 6. 1960, 12. 6. 1960, 13. 6. 1960, 5. 7. 1960 <光華日報>]。

<sup>21</sup> 這 5 點就是：(1) 立即停火；(2) 由聯合國或亞非國家部隊監督停火；(3) 撤退英軍和印尼軍，但大馬軍隊應留駐；(4) 根據〈聯合國憲章〉 1514 文件舉行全民投票，允許北婆羅人民自決；(5) 釋放所有政扣者和恢復正常的民主生活。[詳情見：陳凱希在大馬電台以〈我們的答復〉為題的 24. 4. 1964 講話 [Tan 2000: 226-230] 和陳志群 21. 5. 1964 的國會演詞 [Tan 2000: 384-388]。

由港的地位，当作首要的工作。这份宣言，计划把檳城建成一个有活力，进步和独立的州。<sup>22</sup>

然而，这一切宏图大略，在联盟利用不寻常的心理战术和竞选伎俩的情况下，被全盘打翻了。

在这最强的堡垒中，社阵和檳州劳工党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他们夺取檳州政权的愿望不只落空了，甚至原有的 4 个州议席也给民主联合党夺去；另外一个席位则给联盟夺走了。<sup>23</sup>

这次的惨败对檳州劳党领袖和党员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相信一些党员干部和负责人从此深信，有必要采取强硬路线，来应对这样的制度。

## 1965-1969 : 檳州劳工党思想意识的变迁

---

<sup>22</sup> 5. 4. 1964 <光華日報>。

<sup>23</sup> 例如：李光耀在檳城 24. 3. 1964 的講話。他說，投給社陣一票，就是投給反大馬親共分子一票 [李光耀 1964: 25-30] 敦拉薩則警告說，社陣組成政府的話，將會把大馬國家主權典賣給印尼 [5. 4. 1964 <光華日報>, 26. 4. 1964 <光華日報>]。競選過後，檳州勞黨主席黃添壽分析說，社陣在競選中失敗，主要是因為聯盟和民主聯合黨惡意地指責社陣反大馬親印尼 [12. 5. 1964 <光華日報>]。

1965年2月13日，社阵三个成员党，（也就是劳工党，人民党和国民议会党），在吉隆坡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示威游行，看来那是为了纪念布斯达曼被捕二周年的日子。他们原本打算在精武体育馆举行室内集会，纪念“争取人权日”。下午，发动和平示威。晚上，则举行群众大会。

实际上，在马印对抗期间，三名马来领袖，也就是依沙哈，阿兹依沙，和拿督甘波拉朱于1965年1月被逮捕。政府指控他们，在印尼支持下，试图在国外成立流亡政府（大马政府：1964）。

对劳工党来说，这样专横的逮捕行动，几乎把他们的马来领袖都扫光了。再加上国民服役问题，以及在新预算案下增加苛捐杂税，这意味着大马人民的基本人权，被剥夺了。

这些活动原本当作是反大马计划的延续。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劳工党突显了当时人民生活的艰苦。<sup>24</sup>

<sup>24</sup> 22.5.1998 專訪陳凱希。林建壽，在一份未寫完的稿件中，從法律角度，提出了一個相關的點：“無論根據任何民主原則，我們都不能假設，這些在無審訊情況下被扣留的政扣者，只因他們被提控，就是有罪的。”[見：他準備在1965.2.13 精武體育館發表的演詞]。SZS 証實，這個集會以及后来的街頭示威游行，主要是勞工黨自己決定的，沒受馬共的影響。不過，馬共曾動員同情者，支持這項示威游行。

## 2.13 争取人权日游行大示威

为了应对室内大集会的局面，当局立即作出反应：  
1. 首先，就是警方拒绝发出室内集会的准证；2. 忠告精武体育馆以及其他在吉隆坡可能出租的场所，不得把场所租给社阵；3. 封锁南上北下的通路，阻止社阵党员和支持者赶到首都来；4. 宣布雪兰莪整个州，霹雳州，森美兰州和彭亨州某部分为禁区；5. 逮捕重要领袖如：社阵主席哈斯诺、总秘书达朱、副总秘书陈凯希、劳工党陈潘钦；6. 在集会前夕，播放依沙哈的自白书。

结果，这个室内集会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游行示威的大集会，最终失控，演变成混乱局面，警方则采取严厉行动对付。

### 各州分部对 2.13 事件的反应

事后，2.13 事件成了劳工党城市政治活动的新样板。它立刻在我国的左派人士的政治思潮中引起一些反响。

社阵霹雳州分部认为，它是反新殖民主义斗争划时代的事件。他们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有利教材，所以要所有干部，准备进行更高层次的斗争。

檳坡分部在它的党讯特号中确认，这次运动是“应对‘政府扼杀自由和民主’的一次成功的突破”。

其他分部所表达的意见是，这种新的斗争形式迎来了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崭新的实践方法(Tan 2000: 471; Zhu 2001: 309-313)。

霹雳州劳工党深受新加坡李绍组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根据这个分析，他们将来要采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策略。后来，这个斗争口号转变为：通过工农统一阵线进行“实力斗争”的口号。

以何海平为首的霹雳州一批人，批评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走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除此以外，他们在1965年5月2日党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从此以后，劳工党应该采取“以群众斗争为主，以宪制斗争为辅”的策略。

他们回到霹雳州后，发出指示给所有区联委会，要区联委会研究反驳党中央观点和策略的文件。接着，他们展开经过大事宣传的“红七月”活动。同时，他们抗议警方逮捕社阵干部的最新事件。他们也暴露李光耀，利用大马团结大会，以达到个人目的的阴谋。

## 魏利煌等 5 人集体辞去中委职

他们走的是政治冒险主义的路线，从中还夹有推翻党现有领导层的隐议程。他们对党总书记魏利煌进行大事污蔑，把他形容为叛徒。

霹雳州分部一味坚持实力斗争的路线，拒绝为他们的党员何海平事件作出道歉。魏利煌医生和代主席林建寿经过商量后，决定采取纪律行动，解散霹雳州分部。

但是，解散霹雳州分部的提议不能获得党中委会的通过，因而引发了林建寿，魏利煌医生，陈志群医生，V 大卫，黄安德于1966年3月集体辞职的事件。

为了渡过党内危机，甘幼华，许启针，黄春树三人组成中央秘书处，接管党务，一直负责到举行下届全国代表大会为止。甘幼华担任代主席，许启针当代总书记，而黄春树则担任代副秘书长。

在这事态发展的过程中，槟州劳党还有38个支部在活动，华族党员占86.1%；印族13.5%而马来族则有0.4%。所有支部重组为4个区联委会，那就是：乔治市，阿依淡，北海中区和北海北区。

他们默认，“2.13”事件改变了党的斗争策略和战术。不过，他们誓言将继续遵循宪制斗争的游戏规则。<sup>25</sup>然而，到了年终，当市议会控制权被党市议员的内部纷争所搞跨的时候，基层党员情绪就高昂起来。<sup>26</sup>

### 1965：政府终止地方议会选举

由于发生印尼对抗事件，政府颁布紧急状态。从1965年3月1日起，所有地方议会选举被终止。这就意味着，槟州劳党从此被剥夺了重要的根据地。

### 1965年人民党退出社阵

1965年12月，人民党宣布退出社阵。这是8月新加坡退出大马后左派第一次显露出了阵营内的思想分歧。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不过，它引起了部分劳工党党员的愤慨和悲痛。这可以说是社阵备受

---

<sup>25</sup>30.5.1965 劳工党檳州分部向第13届代表大会提呈的1964/1965常年报告。

<sup>26</sup>黄添寿此时已退出檳州劳党。在人民党和联盟市議員支持下，他向崔耀才挑战。获胜后，他被选为新市长。在一篇声明中，分部说明，1963年，鉴于黄添寿的机会主义本色，党不再提名他为市长人选。他的机会主义本色又一次使他出賣党，以謀求個人名利。他这么做，也使他成了联盟和人民党机会主义者，奪取市議會執政權的傀儡[3.1.1966<新檳日報>]。

尊崇的马来领袖于一月间被捕后的余波。有人认为，这也是另一个消灭我国左派的图谋。<sup>27</sup>

### 1966年州首席部长接管市议会

根据，〈1966年喬治市议会(權力轉移)條例〉，的一切权力操作，从1966年7月开始，交由州首席部长负责。这件事加深了槟劳党对当权者的仇恨。一般认为，这是政府有意阻挠他们夺取市议会政权的一项阴谋。<sup>28</sup>

面对这更大的政治限制，他们的温和路线开始转化为进行政治骚乱的活动。为此，林建寿在第14次分部代表大会的演词中再次强调，劳工党是一个遵循宪制斗争路线的社会主义政党，任何人或任何集团都不能擅自改变党的性质，更容不得由少数激进分子改变党的性质。<sup>29</sup>

---

<sup>27</sup>檳州兩名最有干勁的人民黨領袖陳福興和陳忠武，以及11個支部的黨員，在社陣宣布分裂隔天，支部解散后，加入檳州勞黨[15.12.196<光華日報>]。

<sup>28</sup>1.5.2000 專訪林建壽。

<sup>29</sup>勞工黨檳州分部向29.5.1966第14屆代表大會提呈的常年工作報告。

## “走上街头，深入乡村”的群众路线

然而，就在此时，有“异声突起”。分部在大会的另一份政治文件中，鼓吹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统一战线，采取“走上街头，深入乡村”的群众路线。这份文件坚持“只有通过城市斗争配合乡村斗争，酝酿革命风暴，人民才能打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sup>30</sup>

至于同人民进步党基于最低纲领建立统一阵线的建议，报告书则表示保留。这个立场同霹雳和吉打州的没什么不同[Tan 2000: 543-574]。

劳工党中央积极带头参与反美运动的同时，也忙着准备召开全国代表特别大会。一份题为〈我國社會与勞工党斗争路線〉的重要文件在各分部流传，以供阅读和提出意见。

基于全国执委扩大会议关于扩大群众运动范围的决议，文件宣称，群众斗争应成为宪制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此以后，群众斗争结合宪制斗争将是党的斗争策略。党将以工人阶级思想为指导，促进无产阶级的利益。

<sup>30</sup> 这份以〈當前形勢为党的斗争〉为题的文件，在同一個大會上提早。這個口號，加上所引述的說明，是雪州勞党領袖拉惹占馬于23.5.1965所建議的。

激进的槟州劳工党支持这个提案，说，党应该建立起工农联盟的统一阵线和各阶级联盟的另一个统一战线。文件采用的是极端左倾的词语，用心地解释说，斗争的方向不是对抗，也不是退缩。正确的策略应该是“积蓄力量，逐步前进”[Tan 2000: 531-538]。

较为重视思想意识的支部，如：双溪槟榔和日落洞，积极组织党员参加讨论会，以便把新的路线应用在援越抗美运动中。日落洞支部甚至暗示，可以采用群众斗争作为主要斗争策略。<sup>31</sup>不久，他们提呈了两份基本文件给党中央。这两份文件题为〈正確處理左派內部矛盾〉和〈我們對党斗争路線的意見〉。

## 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党原则

9月24-25日，党召开特别大会，一致通过5项重要决议，并接纳一些文件作为将来发展的蓝图。显然，劳工党受到共产党地下份子的影响，正式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创党原则，接受“工人阶级思想”。党虽然维持群众斗争和宪制斗争相结合的

<sup>31</sup> 双溪槟榔勞工党支部的1966年常年報告；日落洞勞工党支部的1966年常年報告。

策略，但是，邵强调群众斗争为主，宪制斗争为辅。

在反帝反殖反封建和反大马的斗争中，党通过工农统一阵线，加速推行“积蓄和发展进步力量，逐步前进”的政策。实际上，党在蜕变为具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运动 [Tan 2000: 531-540; Zhu 2001: 402-408].

根据这些指导原则，党在各城镇展开一系列街头示威。在党和拘留营内部，一场旨在进行思想革命和革命化行动的运动，在酝酿中。<sup>32</sup>

在槟城，党分部首先推展“学习运动”，宣扬新策略。接着，在 1967 年初，号召实践“一帮一，一对红”的组织概念。以类似金字塔的结构，确保大家在各个岗位上配合行动。支部党员和负责人组成队伍。

---

<sup>32</sup> 有人認為，馬泰邊境的馬共，是只“看不見的手”，影響著檳州和吉打的勞工黨。根據勞工黨領袖和政府白皮書，把勞工黨發展成為馬共影響下的統一陣線的主要負責人，看來，是一名神秘的阿良。[林建壽大約在 1968 年初寫的：〈關於我被扣留的報告〉；17. 7. 1967〈星檳日報〉刊載的大馬電台：〈甘幼華自白書〉；21. 7. 1968〈星洲日報〉；〈鍾錫枝自白書〉；10. 11. 1968〈星洲日報〉；〈許啟針自白書〉；馬來西亞政府 1968: 8。

后来，这些队伍成了群众斗争的重要单位。他们参加示威游行，涂写标语。他们也开会交换意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在许多方面，他们已掌握了实权，取代支部执委会。<sup>33</sup>

但是，到了 7 月的第 15 次分部代表大会，槟州劳工党宪制斗争的立场，还没改变。只要国会和州议会还能操作，仍可作为“暴露敌人，教育群众”的讲台，槟州劳工党会坚持同样的立场。不过，他们还是认为，重点要放在议会外的群众斗争。

就在此时，政府逮捕了甘幼华。所揭发的情况是：槟城分部和大部分支部，由三人秘密小组所控制，而这三人秘密小组是受到马共影响的 [大马政府 1968: 12]。这小组负责一切地下活动，包括培养亲共干部的任务。<sup>34</sup>

##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sup>33</sup> 很好的例子就是日落洞區聯委所組成的 5 個小隊。他們的成員來自日落洞和甘榜东姑支部。他們自稱為“紅旗”等 [Lin & Hong (ed)] 他們自稱為“紅旗”等 [Lin & Hong (ed)]

<sup>34</sup> SZS 在 11. 7. 2001 專訪中，証實這個組織確實存在。他自己是這個小組的領袖 MQC 負責學運 GYH 負責檳州勞工黨的活動 MQC 于 29. 9. 2001 也証實了這一點。



10 月尾，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劳工党也就在这个时候举行了第 13 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启针发表了激昂的演词，强调反动政权肯定失败，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是当前革命的基本问题。他引述毛主席的话，呼吁大家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但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他呼吁听众落实当前革命的口号：“广泛发动群众，宪制斗争应为群众斗争服务！”他把马共的指示文件〈**当前形势的特点**〉的内容纳入了他的政治报告中。

这份后来被接纳的政治报告重申，党决定建立民主集中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sup>35</sup>

大会也通过决议，涉及国际关系，国内课题，和党所面对的问题，包括一系列课题，诸如：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中国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工农统一阵线，群众组织，革命策略等。这些决议充满口号或很左的抽象字眼 [Tan 2000: 668-712; Zhu 2001: 511-524].

<sup>35</sup> 20. 7. 1968 <星洲日報>刊載的〈鍾思金自供書〉; 10. 11. 1968 <星洲日報〉: 〈許啟針自供書〉; 馬來西亞政府 1968: 8.

接着，各种形式的街头示威游行就不时发生，最严重的是 1967 年 11 月 24 日因马币贬值而引发的罢市事件。政府则诉诸于作为镇压的武器。

政府也展开定期的逮捕和搜查行动，以便瘫痪党的活动。<sup>36</sup>

### 甲柔分部及全国 36 支部被查封

槟州劳工党连同马六甲分部，柔佛州分部以及全国 36 个支部，最终被查封。这是不幸发生种族冲突过后的事。

那些在大逮捕中侥幸漏网的领导人和干部，迫不得已转入地下。

这个时候，槟州劳工党产生了一个工作小组，对抵制大选等重要课题，作出集体决定。<sup>37</sup> 原先，他们

<sup>36</sup> 根据当时的报章报道，一系列逮捕事件发生在 25. 10. 1966, 8. 7. 1967, 12. 7. 1967, 19. 8. 1967, 25. 11. 1967, 8. 12. 1967, 13. 12. 1967, 27. 12. 1967, 29. 12. 1967, 6. 1. 1968, 12. 1. 1968, 3. 2. 1968, 14. 2. 1968, 3. 5. 1968, 4. 5. 1968, 30. 5. 1968, 12-13. 7. 1968, 21. 7. 1968, 9. 11. 1968, 8. 10. 1969.

<sup>37</sup> 这个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是 Sg. Pinang 支部的 HPP。早些时候，他在反贬值运动中，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被政府追捕。后来，他设法逃到马泰边境

在 1968 年 3 月 14 日已作出决定，准备参加来届大选。他们曾在一篇题为〈當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文件中，表明了这个立场。

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个立场，反而响应吉打分部抵制 1969 年大选的号召。他们严正声明：由于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一切管道都被封闭了，再来阔谈宪制斗争，那是错误的。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发展革命力量。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抵制 1969 年国州议会选举！”

1968 年 9 月 28-29 日，党中央扩大会议经过讨论后，接纳了这个决定。11 月 9 日，政府又进行了另一轮的大逮捕。为了表示抗议各级立法议会的劳工党议员集体辞职。随后，“用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强硬路线，有待考验 [Tan 2000: 748-751; 760-762].

## 1966-1969 槟劳工党斗争策略和技术

最能体现劳工党反殖民地主义哲学的运动，就是反美援朝的运动。槟州劳党在早期已通过提呈抗议

---

去，于 1970 年 8 月，参加馬共武装斗争。1989 年，泰國、大馬和馬共三方面達致和平協議后，他是回馬的 339 名馬共成員之一 [13.7.2000 專訪]。

书，向联盟首席部长表示对 R&R 计划的不满，<sup>38</sup> 从 1965 年中开始，越南战争升级，那时候，大规模示威游行就已展开。随着美国重新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1966 年 3 月 8 日，当美国副部长班迪到访吉隆坡时，第一次全国性示威运动爆发了。

槟州劳党认为，越南战争，是势不两立的两股势力之间的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因此，援助越南人民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每个人的国际主义义务。<sup>39</sup>

为了实践这个承诺，从 5 月 1 日到 5 月 8 日，他们在槟城展开一系列活动，包括群众大会，讲座，文娱表演等。在槟州各主要支部，都举行越南战争图片巡回展览。这场唤起公众对战争醒觉的运动，后来，于 6 月 24 日，演变成为大规模示威游行。

参与者是霹雳，吉打和槟州的党员和支持者。在这之前，为了转移视线，劳工党的州议员和市议员到首席部长办公室去提呈备忘录。

---

<sup>38</sup> 25.6.1966 <光華日報>

<sup>39</sup> 1.5.1966 <勞工報> 第 2 期

##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大部分参与示威者都集中在槟城路。他们又歌，又喊口号。对他们来说，那是心照不宣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表现。这种活动也当作是一种群众斗争结合宪制斗争的实践。<sup>40</sup>

过后，还有两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反美示威事件。第一次是在10月3日。那是为了强烈抗议美国约翰逊总统到访大马。这次示威分两个阶段进行，那是10月25日全国大逮捕过后的事。

游行示威在早上10点45分开始，主要路线是槟城路和连接的Magazine Road。第二批示威者在下午一点半，集合在霹雳路。日落洞路则是他们和警方捉迷藏的去处。<sup>41</sup>

第二次示威游行在1967年11月2日举行。活动范围只局限在荖尾和亚依淡路一带，目的是为了反对美国副总统韩佛里来大马访问。示威以焚烧他的模拟像达到最高潮[Lin Hong 2001: 80-85]。

<sup>40</sup> 15. 8. 1966 <勞工報> 第4期

<sup>41</sup> 21. 11. 1966 <勞工報> 第7期

每次示威都是在槟州劳党的堡垒区进行。这些都是贫苦华人占多数的地区，也是槟州劳党可展示实力的地区。在紧急关头，这些地区容易躲藏，掩蔽和得到保护。

乡村区如荖尾则有各类房屋零星分散于各处。乔治市和日落洞一带交通拥挤，人口稠密，一片繁忙。这些地区都是“闪电示威”的理想地点。

警方和镇暴队则发射催泪瓦斯，驱逐人群和旁观者。他们采取这类行动时，偶而在人群中可听到“呜呜”的喝倒采声。<sup>41</sup>

## 1967年街头示威司空见惯

1967年，街头示威是司空见惯的事。当时，街头示威是为了突出一些社会和经济课题，以便引起人们关注劳工党所进行的斗争。比较有规模的几场示威，包括声援亚沙汉工潮的五。一劳动节的示威；5月28日，6月2日，1968年3月30日声援华都惹也扣留营和麻营两地政扣者绝食斗争的示威等。

<sup>41</sup> 25. 6. 1966 <光華日報>; 15. 8. 1966 <勞工報> 第4期

槟州劳工党党员和同情者，于 1968 年 8 月 26 日晚上，举起火炬走上街头，乃因国会通过了。就如发生在其他州的情况一样，一些干部和党员行动过火，破坏了一些公共和私人财产。<sup>42</sup>

有些则对“革命形势”估计过高。结果，这些运动发展成为以华人为主的运动，很少获得其他民族的支持。<sup>43</sup>

### 旧马币变相贬值

11 月 9 日，政府宣布旧马币跟着英镑浮动而变相贬值。这就导致 1967 年 11 月 24 日的反贬值运动。

在外汇市场，马币\$1 新钞票，可换取英币 2 先令 8.67 便士。但是，新旧马币之间的兑换率是：马币\$1 旧钞只能换取马币新钞 85.7 仙。<sup>44</sup>

<sup>42</sup> 1. 4. 1968<光華日報>; 27. 8. 1968<星檳日報>。为了澄清檳州勞党對示威期間發生事件的立場，党主席林建壽在 19. 7. 1967 向報界發表聲明，解釋說，檳州勞党原本要举行的是有秩序的和平示威。如果警方不激怒他們的話，他們是不會有粗暴行为的。對於私人财产被破坏事，他表示非常遺憾[20. 7. 1967<星檳日報>]。

<sup>43</sup> 13. 7. 2000 專訪 HPF。

### 非暴力的全岛罢市运动

由于兑换钱币极端困难，而新硬币又奇缺，在槟城市内，一片混乱。11 月 21 日，槟州劳工党分部和支部领导人召开会议，迅速策划一次非暴力的全岛罢市运动。晚上，发动千人示威游行。两天之后，全市屠猪场发动罢卖猪肉。Prangin Road 巴刹猪肉批发商于 11 月 24 日，首先决定罢卖一天，其他巴刹的批发商也跟着参加罢卖。

11 月 23 日，党分部秘书处召开记者招待会，呼吁民众要求政府，恢复旧钞的原有价值。槟州劳工党主席也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人民明确表达他们的一致要求。通过紧密联络，反贬值运动确实成功地使党获得了人民广泛的支持[Zhu 2001: 527-535]。

可惜，没料到的是，一些不幸事件破坏了这项计划。在种族仇恨和种冲突加剧的气氛下，导致财物和人命损失。<sup>45</sup>

<sup>44</sup> 這意味著舊幣貶值 15%，大馬儲備金淨失 24 億 [240M]。

<sup>45</sup> [林建壽在〈關於我被扣留的報告〉中例舉了鬧事的年青人所干的 8 宗暴力事件，包括在 Violet Cafe 吃早餐不還錢，在聯邦戲院外面搗毀販賣香蕉糕的小販檔。不過，在專訪中，HPF 說，一些事件可能是政府派來的內奸故意制造的。

这也表明，槟州劳党没能够把信息很好地传达给马来和印度群众。这些不幸事件也说明了一个现实：已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很容易受原始的感情和种族沙文主义的干扰，而变得不稳定。

11 月全岛罢市虽被誉为群众斗争的成功例子，但是它却影响了槟州劳党的组织结构，使槟州劳工党被封禁，而失去了公开合法的地位，并且也损失了几乎所有活跃的领袖和党员。

第 15 届分部代表会议所选出来的 21 名执委中，除了崔耀才和另外两人，几乎所有执委都被逮捕了，或被迫逃命。

### 劳工党议员全国总辞职

1968 年的最后一天，已被释放的分部主席林建寿，根据党的指示，辞去国州议席。较早时陈福兴和许平城，已从华都惹也拘留营提出呈辞。

从 3 月开始，党基层想执行党抵制 1969 年大选的决定，但是，剩下的支部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动员足够的人手来完成任务。

各区联委通过有限人手的努力，分发宣传品，写标语，贴大字报，沿户拜访等。但是，已不再发动示威游行了。他们认为，这些政治教育的权宜措施，加上劳工党议员全国总辞职所产生的影响，已足以劝阻选民，不要出来投票。<sup>46</sup>

然而，竞选后发生了种族暴乱，议会民主接着终止实施。更重要的是，马共也结束了搞地下统一阵线的政策，使槟州劳党逐渐走向灭亡。[马来西亚政府 1971：11-16]。

### 缺乏纪律为最大祸根

可以这么说：槟州劳工党缺乏纪律，是 1965 年后发生不幸事件的最大祸根。

由于党干部，党负责人和党员，不了解也不尊重党章，包括其宪制合法政党的地位，所以，外来的政治势力有机可乘，对党的思想意识和日常操作，产生了影响。

至于泰南马共的策略以及个别共产党党员，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思想移植到劳工党和统一阵

---

<sup>46</sup> 13. 7. 2000 專訪 HPPF。

线身上，使他们接受毛泽东思想，卻没充份考虑到马来西亚社会的特殊情况。

### 党激进化原因之一：周期性镇压

另外一点，由于联盟政府具有冷战意识，周期性地镇压槟州劳工党和劳工党全国组织，使到那些血气方刚并对政治有浓厚兴趣的青年，对现有秩序感到心灰意冷。槟州劳党力量越被削弱，年青人就越容易接受激进思想和采取剧烈的行动。

具有浓厚思想意识的槟州劳党，没参加 1969 年大选。刚刚成立的民政党刚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在劳工党控制的多数选区，赢得了多数席位而组织了槟州政府。

### 民政党乘虚而入

这个自称非种族性的民政党，是由槟州劳党强人，如：陈朴根和威拉板等创始的。后来加入的有前州议员黄宗和。

另一批槟州劳工党领袖陈崇美和江英华（音译）等，在早些时候，于 1966 年 3 月 19 日，从人民行动党转入民主行动党。至于大部分的槟州劳工党

党员和同情者，则选择不再参加政党政治，转而参与社区福利工作。

头两批人也许对他们个别新组织的初步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不过，只有第三批人，今天已成了社区或压力集团的领袖。时至今日，他们还备受民众的尊崇。<sup>47</sup>

### 结语

槟州劳工党由原本是一个民主协商的社会主义政党，后来蜕变为一个激进反政府的一股社会力量，主要是因适逢其时和当时的环境所使然。

党直接或间接受到马共地下活动的浮沉兴衰所影响，因而它也起起落落。它没考虑到大马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尤其是关于马来社群的课题和问题。

### 槟州劳工党被渗透和被压制

作为看来是遵循毛泽东思想的一股政治力量，槟州劳党被政府渗透和压制。这种情形加深了党员们的

---

<sup>47</sup> 這一批人，其中有許多后来成为成功的商人或專業人士。他們現在是華校董事部或校友會里的有分量的人物。最近，他們組織了一個鳳凰俱樂部，以維持同志之間的情誼。

不安和紧张情绪，进而促使他们走上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所以，他们发动示威游行和展开其他形式的群众斗争。

### 主观教条主义的抽象分析

在那动荡的年代，缺乏深思熟虑能力的领袖，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或计划。其实，他们只是一味盲目接受主观教条主义的抽象分析。

劳工党的衰落和最终消失，标志着，在国家独立后的槟州，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社会主义经验失败了。

接着，从 1970 年代开始，种族政治在政治协商的名堂下，登上了我国政治舞台。

[完]

### 参考资料

Government of Malaysia 1964 A Plot Exposed KL Government Printers.

- 1966, The Militant Communist Threat to West Malaysia , KL
- 1968, The Path of Violence to Absolute Power, Kuala Lumpur : Government Printers

Lee Kuan Yew. 1964. The Wind of Change,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槟城：林子亮、洪森合 (eds.) 2001 Lishi de Fangge <历史的放歌>, 劳工党槟州分部史料图片集工委党史编委会 Labour Party of Malaya, Penang Division

Poulgrain, Greg. (1998). The Genesis of Konfrontasi. Bathurst: Crawford House

陈剑虹编：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  
Kuala Lumpur, 2000. Party History Working  
Committee, Labour Party of Malaya.  
[陈剑虹：〈1952-1972：，马来亚劳工党文献汇编〉]

Vasil, VK 1971.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hu Qiyin et al. (2001). Malaya Laogong Dang  
Dozheng Shi (The Struggle of the Labour  
Party of Malaya: A History), Kuala  
Lumpur, Party History Working Committee,  
Labour Party of Malaya.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作委员会出版 [朱齐英：〈馬來亞勞工黨斗争史〉]

#### 附件：

##### 一) 关于马来亚劳工党斗争问题的 4 点讨论提纲：

1. 马来亚劳工党在五、六十年代领导群众斗争，最后走向抵制 1969 年大选，你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吗？
2. 为何说，“抵制 1969 年大选的决定和行动，在实际上等于是放弃议会斗争”？你认同这种看法吗？为什么？
3. 如果你肯定“抵制 1969 年大选是正确的”，又认同“抵制 1969 年大选的决定和行动，在实际上等于是放弃议会斗争”，这样不是自相矛盾吗？为什么？
4. 有人说：“劳工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马来亚劳工党斗争史》结论说，当劳工党被吊销注册，而结束宪制政党的政治角色之后，它无法也并没有可能完成它最后所提出的历史使命。你认同这种看法吗？为什么？